

老子的水性人格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郑宗军

(泰山学院教师教育学院,泰安 271000)

摘要:老子认为,人性是源于道的朴,具有主动性、柔弱性、复归倾向和自我意识。水性兼具人性和道性。圣人的人格是水性人格,其结构包括“食母”需要、质朴的自我意识和柔弱处世三个组成部分。在环境无条件的积极关注之下,个体通过致虚守静和以“重静”规约“轻躁”的努力,就可以形成水性人格。老子的水性人格理论,对于人格理论的构建和健全人格的培养都具有一定的启示价值。

关键词:老子;水性人格;现实意义

中图分类号:B84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84(2021)06-0483-07

从自然人性观出发,老子构建了独具魅力的人格理论。老子以水喻道以水喻圣人,所以老子的理想人格可以称作水性人格。面对浮躁而且功利主义盛行的现实,老子的水性人格理论宛如一股清流,可以帮助人们冷静地思考一个心理健全的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人格结构以及如何具备这样的人格结构。

1 人性自然

人性观是人格理论的出发点。不同的学者,对于人的本质属性往往持不同的观点,而持不同人性观的学者,也必然会对人格具有不同的思考。老子认为,人的本质属性是自然无为,所以,他的人性观可称作自然人性观。

1.1 人性是源于道的朴

老子五千言没有“性”字,更没有提到“人性”一词。老子的人性观隐含在老子文本的字里行间。老子认为万物源于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42章,文中所引老子章句与章次均以帛书本为据,若帛书本章次与通行本有异,也注明通行本章次),人作为万物之一,当然也是由道化生的。“朴散则为器”(28章),人与其它具体事物一样,都属于“器”。陈黻宸说:“朴之离也以器,而器之成也仍以朴……朴虽散而为器,而器犹不失于道”(陈黻宸,1995,p.65),器之所以能成为器,原因就在于它承载了源于道的朴。不同的器承载了不同的朴,万物由此而生。人之所以不同于其它事物,是因为人承载了不同于其它事物的朴。所以,根据老子的观点,人性就是人内在拥有的朴,是道赋予人的本性。

朴的本义是原木。在老子文本中,朴既指形而下的原料,也指形而上的本真。“道之物,唯恍唯惚。惚呵恍呵,中有象呵。恍呵惚呵,中有物呵”(21章),道中“有象”、“有物”,这些“象”和“物”是

道用以化生万物的基本元素,也就是形而下的原料之朴。“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37章),“老子以‘无名’解释‘朴’,已经明确把它归于形而上学了”(郑开,2018,p.230),这里的“无名之朴”就是形而上的本真之朴。在老子看来,人性是自然本真的,而人性的自然本真来源于道的朴。

1.2 人性之朴的特点

根据老子的观点,不同的事物因承载着不同的朴,而各自具备了不同的属性。人拥有的朴,使人成为人;花草树木拥有的朴,使花草树木成为花草树木;飞禽走兽拥有的朴,使飞禽走兽成为飞禽走兽。朴的多样性,造就了物种的多样性。与其他事物所承载的朴相比,人性之朴具有自己的特点。

首先,人性之朴具有主动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5章),人和动物一样,只有适应天地,才能在天地间生存和发展。但是,人和动物又有所不同,动物只能被动地适应天地,人却明白天地还要效法道,道还要效法自然的道理,所以,人要效法的终极对象是自然之道。这是人的高明之处,人不是被动地适应天地,而是要探究自然之道,找出天地的运行规律,从而做到未雨绸缪,主动地适应外界环境。

其次,人性之朴是柔弱的。柔弱是道的属性,“弱也者,道之用也”(41章,通行本40章),所以,人性的柔弱是承袭自道的柔弱的。也就是说,不仅人性之朴是柔弱的,其他各种事物所拥有的朴也都是柔弱的。但是,人性之朴的柔弱容易被自身的主动性所扭曲。人在主动探究环境的过程中,发现了某些特定的自然之道以后,可能会误以为自己能够运用这些规律来征服一切,从而丧失人性本有的柔弱,变得狂妄自大起来,所以,老子不得不用“强梁

者不得其死”(42 章)来警醒世人。

再次,人性之朴具有复归倾向。复归倾向也是人性承袭自道的属性,是所有事物都具有的属性,“反也者,道之动也”(41 章,通行本 40 章)。“在老子的思想脉络中,‘朴’作为一种有力量的本原,促使万物拥有返朴归真的趋势”(孙永为,2019),“夫物芸芸,各复归于其根”(16 章),人也要“复归其根”。但是,人性之朴的复归倾向容易被自身的主动性所遮蔽。人在主动探究环境适应环境的过程中,随着知识的增多和能力的提高,贪欲和偏见也会随之得到强化,这就给复归之旅增加了变数。为了人的顺利复归,老子提出了“致虚守静”(16 章)的建议,并且明确界定了人之“根”的涵义,“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恒德不离。恒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恒德乃足。恒德乃足,复归于朴。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恒德不忒。恒德不忒,复归于无极”(28 章)。“婴儿”、“朴”和“无极”就是人要复归的“根”。虽然拥有知识能力,但是不能利用知识能力任性妄为,要象“天下溪”一样顺势而为,从而复归“婴儿”的柔协调;不能过度追求功名利禄,要克制自己的贪欲,象“天下谷”一样充实自己,从而复归“朴”的自然本真;不能被偏见所蒙蔽,要象“天下式”一样随时纠正自己的错误,从而复归“无极”的圆融变通。

再次,人性之朴具有自我意识。“低等动物没有自我意识,婴儿的自我意识也没有发展起来”(彭聃龄,2001,p.6)。可以认为,人性之朴的自我意识是其主动性的衍生。人在主动探究环境的过程中,逐渐将“自我”从“非我”中剥离出来,从而产生了自我意识。老子重视自我意识的作用,“知人者智也,自知者明也。胜人者有力也,自胜者强也”(33 章)。

2 水性兼具人性和道性

水性和人性是相通的。人性之朴是柔弱的,而“天下莫柔弱于水”(80 章,通行本 78 章),所以水也是柔弱的;人性之朴具有复归倾向,而水源于大海又回归大海,所以水也具有复归倾向。

水性和道性也是相通的。“上善如水。水善,利万物而有静,居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矣。居善地,心善渊,予善天,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8 章),水具备“默默滋养万物”和“弃高就低”的特性;“道汜呵,其可左右也。成功遂事而弗名有也,万物归焉而弗为主”(34 章),道具有“功成事就而不名为己有”和“万物追随而不主宰”的属性。显然,水以“利万物而有静”完美地阐释了道的“成功

遂事而弗名有”,以“居众人之所恶”完美地阐释了道的“万物归焉而弗为主”。正因为水性与道性相通,所以老子说“水几于道”。

水性兼具道性和人性,所以“‘道性’ – ‘水性’ – ‘人性’,就此成为了一个一以贯之的、统一的有机整体”(涂阳军,郭永玉,2011),人也就可以因水悟道进而以心体道,形成水性人格。

圣人“辅万物之自然而弗敢为”(64 章),他平等地对待万物,没有偏袒没有歧视,也不规定万物的成长进程和成长目标,仅仅是辅助万物以其自身的方式成长为它本应成为的样子。显然,正如水以“利万物而有静”来阐释道的“成功遂事而弗名有”一样,圣人则以“辅万物之自然而弗敢为”来践行水的“利万物而有静”。

圣人“欲不欲,而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64 章),他追求众人所不追求的,所以不看重众人所看重的珍稀财物;他学众人所不学的,所以能补救众人所犯的过错。显然,正如水以“居众人之所恶”来阐释道的“万物归焉而弗为主”一样,圣人则以“欲不欲”和“学不学”来践行水的“居众人之所恶”。

“利万物而有静”是水对万物的态度,“居众人之所恶”是水对自身的态度。同样,“辅万物之自然而弗敢为”是圣人对万物的态度,“欲不欲”和“学不学”是圣人对自身的态度。可见,圣人像水一样对待万物和自身,所以圣人的人格就是水性人格,是老子的理想人格。

3 水性人格的结构

人性是人格发展的基础。但是,在相同人性的基础上,圣人形成了水性人格,更多的人则与水性人格渐行渐远,原因就在于圣人有着与众不同的需要、自我意识和处世风格。

3.1 “食母”需要

人格是个体在追求需要满足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不同的人因为需要不同以及需要的满足方式不同,所以就会形成不同的人格特征。

世人多追求感官享乐,计较名利得失,圣人却对此无动于衷。“众人熙熙,若饗于大牢,而春登台。我泊焉未兆,若婴儿未咳”(20 章),面对美食美景,“众人”乐在其中,“我”却像不会笑的婴儿一样没有反应,这是“众人”和“我”对待感官享乐的不同;“俗人昭昭,我独若昏呵。俗人察察,我独闷闷呵”(20 章),面对名利得失,“俗人”明察秋毫分星擘两,“我”却浑然不觉糊涂不明,这是“俗人”和“我”对待名利得失的不同。“我”和“众人”之所以存在这

样的区别,根本原因就在于“我欲独异于人而贵食母”(20章),“我”的追求与众不同,而重视“食母”需要的满足。

“食母”二字,历来众说纷纭。其中,劳健的解释最为可取,“劳健云:‘食’音嗣,养也。‘母’谓本也。知养其本,乃可以绝役智外求诸末学,而无忧也”(高明,1996,pp.326-327),“食母”即“养本”,“养本”即“归根”,也就是滋养人性之朴以实现复归倾向。所以说,圣人也有欲望,而且他的欲望还很强烈,圣人的欲望就是“食母”。“五色使人目盲,驰骋田猎使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使人之行妨,五味使人之口爽,五音使人之耳聋”(12章),“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44章),过度的感官享乐和名利贪欲会残损人性之朴,妨碍“食母”需要的满足,所以圣人“为腹而不为目”(12章)。

水是“利万物而有静”的。以水为鉴,“圣人无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予人矣己愈多”(68章,通行本81章),“己愈有”就是充实人性之朴,“己愈多”就是丰富人性之朴。可见,“食母”需要可以通过“为人”、“予人”的方式来获得满足。“为人”、“予人”就是辅助他人自然成长。在这里,圣人将利他和利己统一了起来,圣人“辅万物之自然而弗敢为”的行为既有利于万物的自然成长,也有利于圣人的“食母”需要的满足。也就是说,圣人通过谨慎辅助万物的自然成长来满足自己的“食母”需要。以水性类比人性,圣人的“辅万物之自然而弗敢为”具体表现为“居善地,心善渊,予善天”。

“居善地”,水位处卑下,便于万物汲取,圣人像水一样谦卑,即“圣人之欲上民也,必以其言下之;其欲先民也,必以其身后之”(66章);“心善渊”,水聚而为渊,清澈深幽,任由水草滋生鱼儿遨游,接纳万物沉浮,圣人像水一样包容,即“上德如谷”、“广德如不足”(40章,通行本41章);“予善天”,通行本作“与善仁”,因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38章),而水“几于道”,显然并未“失道”,更谈不到“失德”,自然不可能追求“仁”,所以,通行本的“与善仁”必是后人擅改,绝非老子本意,此处当从帛书本的“予善天”。水不仅可以在地聚而为渊,还可以化为雨雪自天而降,主动地施恩于万物,却不索取回报,圣人像水一样博爱,即“生而弗有也,为而弗恃也,长而弗宰也,此之谓玄德”(51章)。

3.2 质朴的自我意识

个体具备明确而稳定的自我意识,就能在成长过程中始终保持自我的独特性,形成不同于他人的

人格特征。

圣人的自我意识是质朴的。在自我认知上,圣人是“自知”的。“知不知,尚矣。不知不知,病矣。是以圣人之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73章,通行本71章),圣人知道自己有所不知,所以他不会自以为是,遇到不同观念,就会改进和补充自己的观念,使自己的认知越来越全面和深刻,即“不自是故彰”(23章,通行本22章)。圣人“自知而不自见也”(74章,通行本72章),他既知其知,也知其不知,从不炫耀自己的所知所能,即“不欲见贤也”(79章,通行本77章)。

在自我体验上,圣人是“自爱”的。我国古籍中的“自爱”包括自我珍重、自我接纳和自我约束三个主要指标(薛黎明等,2020)。老子所说的“自爱”,主要是指自我珍重和自我约束。老子认为,圣人“自爱”,爱的是自身的人性之朴,由于过度的享乐和贪欲会残损人性之朴,所以他“知足”、“知止”(44章)以保全自己的人性之朴。“自爱”的极端是“自贵”,圣人“自爱而不自贵也”(74章,通行本72章),即“被褐而怀玉”(72章,通行本70章),此处,“玉”喻指人性之朴,“褐”喻指谦卑。因为“怀玉”所以“自爱”,因为“不自贵”所以“被褐”。“自贵”者认为自己尊贵而他人卑贱,因而不能平等待人,更不能谦卑待人。圣人“不自贵”,因而能平等待人,也能保持谦卑。

在自我控制上,圣人是“自胜”的。因为“辅万物之自然”的过程就是滋养人性之朴的过程,也就是“食母”的过程,所以圣人为了满足其“食母”需要就会主动地发起“辅万物之自然”的行为;因为极端、过分、奢侈都是对自然之道的违背,不仅不能“食母”,反而会“损母”,所以圣人也会主动地抑制这些行为而“去甚,去泰,去奢”(29章)。

“自见”、“自贵”以及“甚泰奢”都是众人所喜好的,圣人象水一样“居众人之所恶”而“不自见”、“不自贵”、“去甚,去泰,去奢”。以水为鉴,在质朴的自我意识的支配下,圣人的“欲不欲”和“学不学”体现出了“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的特点。

“言善信”,潮水涨落有定时,从不失信,圣人像水一样诚信,因为“轻诺必寡信”(63章),所以在做出承诺之前,他会“猷呵,其贵言也”(17章),不像众人那样随意许诺却言而无信;“政善治”,水冲洗污垢,以恢复事物的本来面目,圣人像水一样率真,作为管理者,他会“以不智治邦”(65章),舍弃所有的智谋权术,光明磊落地对待员工,不像众人那样虚

伪欺诈;“事善能”,水流直则一往直前,曲则蜿蜒曲折,逢高则徘徊聚集,遇低则奔腾而下,圣人像水一样顺势而为,即“善行者无辙迹,善言者无瑕谪,善数者不用筹策,善闭者无关键而不可启也,善结者无绳约而不可解也”(27 章),这里的“善行、善言、善数、善闭和善结,都具有自然而然、顺其自然的特征”(李庆安,2016),不像众人那样肆意妄为;“动善时”,雨雪按四季自天降落,霜露分朝夕在地凝结,圣人像水一样择时而动,即“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64 章),不像众人那样临时起意仓促冲动。

3.3 柔弱处世

“柔”,《说文解字注》云:“凡木曲者可直、直者可曲曰柔”。可见,“柔”的本意是指木容易由曲变直也容易由直变曲,引申为“易于接受外界影响而发生变化”;“弱”的释义是“力气小,势力小”,意即“对外界的影响小”。“柔”与“弱”合称,“柔弱”就是多适应外界少干预外界,即使必须干预外界,也应采取潜移默化似有若无的方式,即“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2 章),这正是老子的无为思想,所以,“柔弱”也就成了老子心目中圣人的处世风格。老子还认为,“坚强死之徒也,柔弱生之徒也”(78 章,通行本 76 章),坚强是衰亡的征兆,柔弱是生机的象征(陈鼓应,白奚,2001, p. 188),圣人舍坚强而取柔弱,即“守柔曰强”(52 章)。圣人对柔弱的坚守,突出地表现在“三宝”上,“我恒有三宝,持而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69 章,通行本 67 章)。

“慈”是情感的柔弱。情感柔弱,就能够感受他人的体验,与他人产生情感共鸣,痛苦他人的痛苦,快乐他人的快乐,也就能用他人所愿接受的方式去辅助他人,从而“辅万物之自然”。反之,不“慈”就会用自己的体验取代他人的体验,即使帮助他人,也只能采取生硬的方式,只想“令万物之我然”,不能“辅万物之自然”。

“俭”是认知的柔弱。“俭”的本意是节约,也指以最小的付出,获得最大的收益。在老子文本中,“俭”和“啬”是相通的,“治人事天莫若啬。夫唯啬,是以早服,早服是谓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59 章)。韩非子《解老》云:“啬之者,爱其精神,啬其智识也”(高明,1996, p. 115),“啬”就是爱惜精力,要少费精力而取得“治人事天”的良好效果,就必须“早服”,“早服”就是“重积德”,所谓“重积德”就是不断地掌握“治人事天”的规律。按规律办事,不仅少费精力,而且无往不胜,力量无穷。可见,“俭”是和掌握规律分不开的,而

掌握规律显然属于认知活动。认知柔弱,就不会自以为是,就会脚踏实地地调查研究,虚怀若谷地征求他人的意见和建议,不断地完善行动方案,最终取得事半而功倍的效果,也就是“俭”或者“啬”;反之,认知不柔弱,就会固执己见,刚愎自用,一意孤行,从而耗费大量的精力,表现为好大喜功而收效甚微,这就是浪费了。

“不敢为天下先”是行为的柔弱。行为柔弱的具体表现是退让和谨慎。在众人奋勇争先时,圣人就会退让,“圣人退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不以其无私耶? 故能成其私”(7 章),圣人的无私退让恰好满足了他自身的“食母”需要,甘居人后反而比众人早一步滋养人性之朴,置身事外反而得以保全人性之朴。“不敢为”也有谨慎而为的意思,在众人畏缩不前时,圣人就会挺身而出谨慎而行,“豫呵其若冬涉水,猷呵其若畏四邻,俨呵其若客”(15 章),小心翼翼就像冬天踏冰过河,提防戒备就像担心周围干扰,端庄肃然就像客人拜访主人,根据实际情况随时调整自己的言行。

圣人柔弱处世,具有强烈的“食母”需要和质朴的自我意识,所以形成了水性人格,水性人格的结构可以以下图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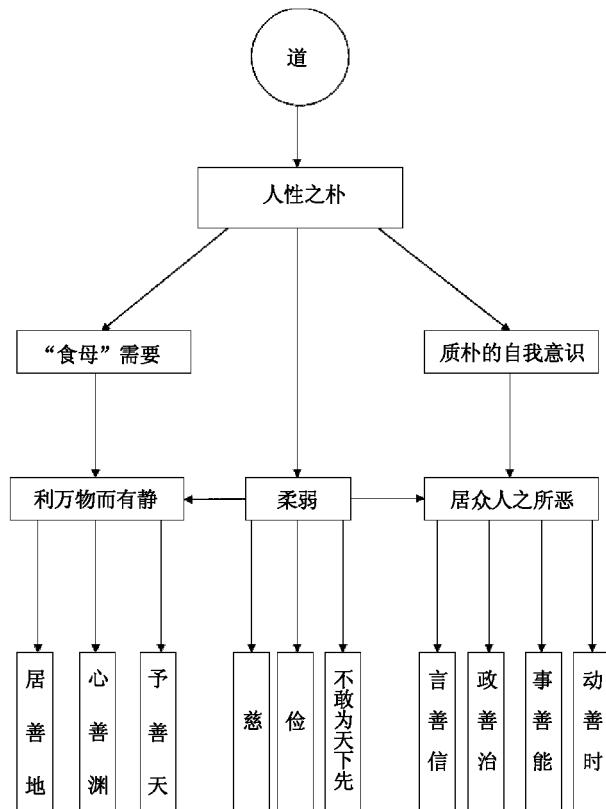


图 1 水性人格结构模式图
人性之朴源于道。“食母”需要、质朴的自我意

识、柔弱源于人性之朴,是水性人格结构的组成部分。“利万物而有静”,也就是圣人的“辅万物之自然而弗敢为”,是满足“食母”需要的途径;“居众人之所恶”,也就是圣人的“欲不欲”、“学不学”,是质朴的自我意识的外在表现;柔弱则是“利万物而有静”和“居众人之所恶”的认知基础、情感基础和行为基础。因为柔弱,所以圣人在认知上掌握了万物的发展规律,在情感上因万物的自然成长而喜悦因万物的病态变化而悲伤,在行为上谨慎辅助万物的自然成长,所以自然而然地“利万物而有静”;因为柔弱,所以圣人在认知上理解众人的争强好胜,在情感上因众人快乐而快乐因众人悲伤而悲伤,在行为上退让不争,所以自然而然地“居众人之所恶”。“利万物而有静”和“居众人之所恶”也是相辅相成的,如果“居众人之所好”,那就不是“我利万物”,而是“万物利我”了。“居善地,心善渊,予善天”是源于“利万物而有静”的人格特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是源于“居众人之所恶”的人格特征,“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则是源于柔弱的人格特征。

4 水性人格的形成

水性人格的形成与人性之朴的主动性密切相关。在个体的人格发展过程中,人性之朴的主动性会从正反两个方面发挥作用。它既可以强化个体的“食母”需要,使人主动采取“利万物而有静”的方式来满足这一需要,从而实现其复归倾向,也可以遮蔽其复归倾向,弱化甚至淹没“食母”需要,而使人主动追求名利贪欲的满足;既可以使主动保持自我意识的质朴,始终“居众人之所恶”,也可以使人放弃自我意识的质朴,主动追求“居众人之所好”;既可以使主动坚守柔弱的处世风格,也可以扭曲人性的柔弱而使人主动采取刚强的处世风格。可见,圣人之所以会形成水性人格,是因为他的主动性起了积极的作用;众人之所以与水性人格渐行渐远,是因为他们的主动性起了消极的作用。

4.1 致虚守静

个体在与环境的互动过程中,会获得一定的知识能力。如果个体运用这些知识能力去追求名利,他的人性之朴就会受到残损,也就不能形成水性人格了;如果个体运用这些知识能力去“利万物而有静”,他的人性之朴就会得到滋养,从而有利于形成水性人格。

老子建议采取“致虚守静”的方式来处理自身获得的知识能力,“致虚极也,守静笃也”(16章)。“致虚”就是消解,将知识能力融入心理结构;“致虚

极”就是彻底消解,将知识能力完全融入心理结构,使自己意识不到自己的知识能力,却能自然而然地运用这些知识能力。“归根曰静”(16章),而“归根”即“养本”,“养本”即“食母”,所以,“守静”就是滋养人性之朴,“守静笃”就是采取实际行动来滋养人性之朴,这里的实际行动就是运用自己的知识能力“利万物而有静”。因此,“致虚守静”意即将自身获得的知识能力融入心理结构,并且通过自然地运用这些知识能力辅助万物自然成长的方式来滋养自身的人性之朴。

在老子看来,知识能力不是用来炫耀的,“自是者不彰,自见者不明,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其在道也,曰余食赘行”(22章,通行本24章),所以需要“致虚”并且“致虚极”;知识能力也不是用来追求名利贪欲的,“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恒足矣”(46章),所以需要“守静”并且“守静笃”。只有在主动地谨慎地运用自己的知识能力去辅助万物自然成长的过程中,个体的人性之朴才能得到滋养,从而形成“居善地,心善渊,予善天”的人格特征。

4.2 以“重静”规约“轻躁”

“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是以君子终日行,不离其辎重。虽有营观,燕处则超然”(26章)。韩非子在《喻老》里说到,“制在己曰重,不离位曰静”(高明,1996, p. 355),也就是说,自我控制有主见为“重”,与“重”相反,受环境所左右,盲目从众则为“轻”;坚守本性不动摇为“静”,与“静”相反,迷失本性,胡作非为则为“躁”。个体总是处在特定的环境中来谋求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是多变的,不会始终处在理想状态之中,有时,受恶劣环境的影响,个体不得不做出妥协时,也应尽最大努力,力所能及地控制自己,让“重静”对“轻躁”加以最大限度的约束。例如,一个销售人员,当他的经理要求其把一件次品充作精品销售时,尽管他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自己的人性之朴,但是他却答应下来,只是在顾客挑选商品时,他以巧妙的方式不动声色地把这件商品的残损之处暴露出来,顾客自然会舍弃它而选择真正的精品,这就是“重为轻根,静为躁君”。

受各种因素影响,一个人难免做出“轻躁”的行为,但是即便如此,只要他能主动地用自己的“重静”来对“轻躁”行为加以约束,那么他也仍然不失其君子本色。所以,老子说“君子终日行,不离其辎重”。“辎重”,本意是指军队用以运输物资装备的车辆,在这里喻指人性之朴。即使身处繁华纷乱之处,由于“不离其辎重”,那么个体也能始终保持内

心的清醒与淡定,只要不迷失本性,有所变通也未尝不可。这样也就保证了“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的人格特征的形成。

4.3 无条件的积极关注

致虚守静和以“重静”规约“轻躁”都是形成水性人格的主观条件。除此之外,水性人格的形成也与良好的外在环境有关。爱护和信任的心理氛围,是个体形成水性人格的重要的环境条件。

“善者善之,不善者亦善之,德善也。信者信之,不信者亦信之,德信也”(49 章)。一个人无论是“善者”,还是“不善者”,无论是“信者”,还是“不信者”,环境都能“善之”“信之”,给他足够的爱护和信任,他就能够得以自然成长,从而“德善”、“德信”。每一个人都希望被爱护被信任。在很多情况下,当一个人表现出符合社会规范的行为时,他就会得到外界的爱护和信任;当他表现出违背社会规范的行为时,就会受到外界的惩罚和猜疑。爱护和信任相当于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所说的积极关注。罗杰斯认为,由于积极关注往往是有条件的,所以为了得到外界的积极关注,个体就可能忽视、歪曲或者否认自己的真实体验而一味地迎合环境服从权威,从而出现心理失调。鉴于此,罗杰斯提出了无条件的积极关注(许燕,2009, p. 335),即一个人无论如何表现,外界都爱护他信任他,促使他接受自己的真实体验,自觉地做出符合社会规范的行为,也自觉地摒弃违背社会规范的行为。可见,罗杰斯的理念与老子的思想是契合的。由于积极关注是无条件的,所以处在这种良好的心理氛围之中,一个人就不会伪装成“善者”“信者”以换取外界的积极关注,而是完全从自己的本性出发来自如地行为,从而主动地坚守柔弱,做到感同身受地理解他人、全面准确地探究环境、谨言慎行地应对一切,促使他形成“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的人格特征,自然而然地成长为真正的“善者”“信者”。

5 水性人格理论的现实意义

老子的思想形成于春秋末期,迄今约 2500 年的历史,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特别是他的水性人格理论,对人格理论的构建和健全人格的培养都具有一定的启示价值。

在理论构建上,首先,老子通过比较圣人与众人区别的来构建圣人的人格结构,这就使得他的水性人格理论成为一种理想人格理论,天然地具备积极向上的特点。其次,老子明确了人格的结构。根据老子的观点,人格结构包括需要、自我意识和处世风格三个组成部分。其中,需要是人格发展的动力,自

我意识是人格发展的调节机制,处世风格则制约着需要的满足方式和自我意识的外在表现。在老子看来,圣人和众人在人格结构上的区别是,圣人的需要以“食母”为主,众人的需要则以名利为主;圣人的自我意识是质朴的,众人的自我意识则是浮华的;圣人柔弱处世,众人则刚强处世。再次,老子揭示了人格发展的动态循环过程。老子认为,人性之朴具有复归倾向,圣人的人格发展过程就是复归倾向的实现过程。需要的发展历程是由“食母”而名利,然后复归于“食母”;自我意识的发展历程是由质朴而浮华,然后复归于质朴;处世风格的发展历程是由柔弱而刚强,然后复归于柔弱。可以说,在人格发展过程中,圣人的需要、自我意识和处世风格的发展都完成了复归之旅,实现了复归倾向,所以形成了水性人格;众人则未完成复归之旅,没有实现其复归倾向,他们的需要的发展止步于名利,自我意识的发展止步于浮华,处世风格的发展止步于刚强,所以没有形成水性人格。

在健全人格的培养上,一方面,老子明确了健全人格的标准。在老子看来,“居善地,心善渊,予善天,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的七善和“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的“三宝”就是健全人格的培养目标。另一方面,老子指出了健全人格的培养途径。根据老子的观点,众人之所以没有形成水性人格,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完成复归之旅,所以,为了培养他们的健全人格,就需要帮助他们重启复归之旅。重启复归之旅的途径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明确知识能力的终极价值。老子认为,知识能力的终极价值在于滋養人性之朴,并且只有在运用知识能力“辅万物之自然而弗敢为”的过程中,知识能力才会被消解、被用来滋養人性之朴,所以应该告诫人们只有运用知识能力服务于社会才是对待知识能力的正确态度,人们一旦形成这样的态度,就会自然地重启其需要发展的复归之旅,从而逐渐形成“居善地,心善渊,予善天”的人格特征。第二,开展以“自知”、“自爱”、“自胜”为主题的教育活动。通过开展这样的教育活动,人们就会全面而准确地认识自我评价自我,就能爱惜自己的人性之朴而不至于胡作非为,就能主动做出有利于自我发展的行为并且主动克制有害于自我发展的行为,从而自然地重启其自我意识发展的复归之旅,逐渐形成“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的人格特征。第三,创设以爱护和信任为基调的心理氛围。在家庭教育中,家长要无条件的爱护和信任孩子;在学校教育中,教师要无条件的爱护和信任学生;在企事业单位

的工作运行中,管理者要无条件的爱护和信任员工。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对儿童、学生、员工的无条件的爱护和信任与对他们的缺点错误进行批评教育是不矛盾的。家长、教师、管理者应该把儿童、学生、员工的行为与他们本人区分开来。无论他们有什么样的缺点错误,家长、教师、管理者都要始终保持对他们的爱护和信任,也应在爱护和信任的基础上对他们的不良行为予以批评教育,相信并且鼓励他们改正缺点错误。同时,还需要强调的是,爱护和信任是相互的。家长、教师、管理者要无条件的爱护和信任儿童、学生、员工,同时,儿童、学生、员工也要无条件的爱护和信任家长、教师、管理者。这样,家长和儿童、教师和学生、管理者和员工就都能自然地重启其处世风格发展的复归之旅,逐渐形成“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的人格特征。通过这三种途径,人们就会逐渐形成谦卑、包容、博爱、诚信、率真、顺势而为、择时而动、富同情心、有探究精神、谨言慎行的人格特征。

自奥地利精神病学家弗洛伊德开创精神分析学派以来,西方学者构建了各种各样的人格理论,包括精神分析、行为主义、人本主义、特质理论、认知等学派的观点。这些理论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对人格的本质、人格的结构、人格的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用来描述、解释和预测个体的人格及其发展,并试图为健全人格的培养提出有效的途径或方法。但是,这些理论都深深地植根于西方文化的土壤之中,在描述、解释和预测中国人的人格及其发展时,都或多或少存在着“水土不服”的现象。究其原因,不仅在于人格的复杂性,也在于人格的发展必定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而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也就导致了西方的人格理论可供借鉴,但不可照搬照用。杨国枢说

过,“用世界型的类型与学说的一般性研究,无论如何认真实施,总不可能阐明作为一个文化群体的中国人的独一无二的和最有代表性的中国人的人格特征”(杨国枢,1990,p.163)。以老子思想为代表的道家思想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一,以从老子思想中挖掘出的水性人格理论作为主体,对西方的人格理论进行改造,并纳入其合理成分,这样也许就能够更准确地描述和解释中国人的人格,更准确地预测中国人的人格发展和中国人在特定情境中的具体行为,据此提出的健全人格的标准也就更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由这一理论而生发的健全人格的培养措施,也就更符合中国国情和中国人的特点,从而能够更有效地促进中国人的人格健全。

参考文献

- 陈德溥.(编).(1995).陈黻宸集.北京:中华书局.
陈鼓应,白奚.(2001).老子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高明.(1996).帛书老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
李庆安.(2016).基于中国文化的人格与动机理论——中国人格模型与关键需要理论.心理科学,39(2),497–511.
彭聃龄.(主编).(2001).普通心理学(修订版).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孙永为.(2019).试论老子“朴”的哲学意义.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8),50–53.
涂阳军,郭永玉.(2011).“道”性、“水”性、人性、中国人人格.心理学探新,31(4),291–296.
薛黎明,黄希庭,岳童,赵豫龙,段成文,马苏彦.(2020).“自爱”指标与维度的初探—《四库全书》中“自爱”的心理学研究.心理学探新,40(5),397–402.
许燕.(2009).人格心理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杨国枢.(1990).中国人的心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郑开.(2018).道家形而上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Laozi's Theory of Water Personality and It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Zheng Zongjun

(School of Teacher Education, Taishan University, Taian 271000)

Abstract: Laozi believes that human nature is the Pu originating from Tao, with initiative, weakness, reversion and self-consciousness. Water nature has the nature both human and Tao. Sage's personality is water personality, and its structure includes three parts: the need of “Simu”, simple self-consciousness and weak life. Under the unconditional positive attention of the environment, the individual can form the water personality through the efforts of Zhixushoujing and using “Zhongjing” to regulate “Qingzao”. Laozi's theory of water personality has certain enlightenment valu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personality theory and the cultivation of sound personality.

Key words: Laozi; water personality; practical significance